



论三苏的三国史观及其思想张力*

马 强

摘要:在苏洵、苏轼、苏辙的历史文化知识体系中,三国历史及人物占据着重要地位。三苏的三国史观广泛体现于政论、史论、诗词等各类著述,三国人物与史事是三苏政论、策论里的关键史实依据与用典来源。得益于巴蜀地区深厚的三国文化熏陶,生长于蜀地文化世家的三苏,对三国人物与史事自然稔熟于心,关注超乎常人。三苏父子对三国的论述各具特色,就所涉及的三国史事与人物而言,苏洵擅长对三国军事地理展开评论,尤其重视三国蜀道军事地理方面的史事;苏轼对三国人物的评论具有鲜明的反思性与批判性,其三国史观在当时独树一帜;苏辙有关三国的论述相较于其父兄最为丰富,在奏议、史论中援引极频,注重总结三国政治、军事以及历史人物成败的经验教训,善于以古鉴今,常将三国史事作为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例证,这构成了苏辙三国史观的显著特色。他们的三国史论,共同构成了宋代历史思维中一个深邃而富有活力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三苏;三国史观;军事地理;人物品评

中图分类号:K244;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6-0041-08

波澜壮阔的三国历史与风采各异的三国人物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也是后世士大夫长期关注、谈论的话题之一,致使“论三国”“品人物”的文化现象长盛不衰。唐宋政治社会处于重大转型期,在经学、文学、史学领域内三国史是经常讨论的话题,“唐宋八大家”的文集中都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对三国政治得失、战争成败、人物优劣的评论。而苏洵、苏轼、苏辙三大家涉及三国的言论更多,从侧面代表了北宋士大夫对三国历史的认知与人物评论的价值取向,同时这一取向也是北宋政治、文化思潮在历史评论中的反映。

一、北宋的三国文化思潮概说

处于汉晋之间的三国时代虽然时间并不算

长,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与结束,三国军事战争的恢宏与成败,诸多叱咤风云的三国人物的风貌与命运,三国政权正统性的判定,以及曹魏屯田、九品中正制等制度,皆反复成为后世历史研究、士大夫评论以及文学创作取材、用典的重要对象,也长期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

从史学评论来看,三国政权的正统地位及历史人物的孰是孰非等评论早在东晋南北朝时便已流行,《襄阳耆旧记》《世说新语》以及裴松之对《三国志》所作注解中,均不乏三国史事与人物的相关评论。尤其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堪称三国人物与史事轶闻笔记的集大成之作。至唐代,三国政治曾是王朝君臣讨论的热点话题,吴兢《贞观政要》中就记录了不少唐太宗与臣下讨论魏、蜀政治得失的对话。北宋是

收稿日期:2025-04-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190)。

作者简介:马强,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715),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

结束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以后建立的统一王朝，从庆历初年开始，在范仲淹、石介、欧阳修等一批士大夫的积极推动下，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兴起重振纲纪、重建国家正统秩序等思想运动。在这一逐渐兴盛的“重振纲纪”思潮中，三国政治的正统与人物的品行优劣等，成为士大夫经常讨论的话题，苏洵、苏轼、苏辙、张方平、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人都曾发表对三国史事与人物的见解，并就魏、蜀孰为正统的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

欧阳修在《魏论》中写道：“魏之取汉，无异于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1]282}他进而提出“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的观点。在欧阳修看来，魏从汉朝那里获得正统，他还说：“刘备汉之后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别称蜀，不得正统，可也。”^{[1]276}欧阳修身为当朝重臣兼文坛领袖，其言论影响自然非同寻常，然其观点亦存有内在矛盾。一方面，其主张魏为正统，肯定曹魏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其在情感上却倾向褒扬蜀汉刘备、诸葛亮君臣。这种矛盾使其观点有“和稀泥”的调和之嫌，更何况刘备政权所打出的旗号始终是“汉”而非“蜀”，后世之东晋、南朝、南宋等皆以刘备之“汉”为正统王朝视之。其宾客章望之因之与欧阳修产生分歧，著《明统》以辨之^①。司马光作为北宋一代史家巨擘，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以曹魏之年号纪年，还多次用“入寇”一词来表述诸葛亮的北伐。王安石则批驳欧阳修、苏轼在三国正统问题上的调和论，甚至就正统问题发表过攻击欧、苏的极端言论^②。

三国正统论之争所呈现的并不仅仅是尊刘贬曹的价值取向，实则关涉魏、蜀、吴三家政权的合法性，进而上升到历史上的封邦建国与帝统传承是否符合儒家政治伦理及其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时期的人心向背等重大问题。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这虽然是在西晋初期特殊的政治语境中修史观念的产物，但至北宋时期，关于三国政权孰为正统的争论实际上已经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革新与守旧矛盾冲突的一种反映。这一时

期甚至出现“重写”《三国志》的提法，王安石就曾劝导苏轼担当此任，但被苏轼谢绝^③。欧阳修在《明正统论》中说：“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而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1]280}同时他认为三国是汉代以来的“乱极”时代，“汉之弊也，乱极于三国；魏晋之弊也，乱极于永嘉以来”^{[1]1887}。这表明其对三国历史地位的重视及对社会历史盛衰兴亡的规律性认知。北宋的三国正统之争呈现出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倾向，在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下自然不会有“一边倒”的定论。苏洵的《攻守》《强弱》篇，苏轼的《魏武帝论》《诸葛亮论》等，都是当时讨论三国军事、政治的代表性史论。

宣和五年（1123年）礼部颁布“武成王庙从祀”，形成尊刘与褒曹并存局面，这种做法实则是调和矛盾，各取所需。蜀汉的诸葛亮、张飞、关羽，曹魏的邓艾、张辽，东吴的吕蒙、陆抗、周瑜和陆逊皆位列北宋配享祭祀的前代武将中。关羽崇拜则在北宋发展到高峰，宋徽宗先后赐封关羽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等。关羽崇拜的不断升级与神化，表明北宋对三国政治历史与不同集团人物的推崇与包容。北宋对三国政治集团孰为正统并无定论，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曾下诏奉蜀汉为正统，将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列入祭祀对象；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在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以及载于祀典的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的诏令中，刘备、诸葛亮皆位列其中。成都的武侯祠、惠陵、汉昭烈庙历经多次修缮，香火渐趋旺盛。而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仍遵循陈寿著《三国志》的政治取向，尊奉曹魏为正统，奉魏正朔，尊魏帝号。靖康之难后随着宋室南迁，南宋的情况与东晋相似。蜀汉的正统地位再次得以确立，曹魏的正统地位则被否定。

对三国历史的反思与评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北宋政治思想史在三国评论这一节点上的折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北宋相对自由的评论三国文化语境中，苏洵、苏轼、苏辙的三国文化史观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有鲜明的自我价值取向。

二、军事地理与品评人物的三国史论维度

苏洵、苏轼、苏辙针对三国政治、军事以及人物的评论，广泛分布于他们的策论、奏折、史论、诗词等各类文献之中，他们对三国的评论各有侧重，从多个方面反映了三苏对三国历史的评论及其三国文化史观。

苏洵在蜀地深耕经史古文多年，一入汴梁即深受文坛领袖欧阳修赞赏，很快“名动京师”。他擅长史论、政论，其论述明晰畅达，笔力雄浑劲健，行文纵横开阖，其史论对魏禧、顾祖禹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魏禧“喜读史，尤好《左氏传》及苏洵文。其为文凌厉雄杰”^[2]；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的写作风格与历史地理评论亦明显带有苏洵史论的印记。苏洵的三国历史评论主要集中于“兵要”地理，即三国军事地理，其史论《攻守》《强弱》《项籍》皆为评论三国军事地理的名篇。苏洵善于总结战国秦汉与三国军事的成败，多从宏观角度评论三国蜀汉的兴亡，他说：“秦之忧在六国，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后取，非其忧在蜀也。诸葛亮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国，取一阵，皆如是也。”^{[3]40}他认为诸葛亮对魏国与蜀汉的强弱形势认识不足，贸然出兵伐魏，最终导致蜀汉的衰亡。在评论三国赤壁之战与钟会入蜀之战时，他又说：“所谓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吴之长江，蜀之剑阁是也。昔者六国尝攻函谷矣，而秦将败之，曹操尝攻长江矣，而周瑜走之，钟会尝攻剑阁矣，而姜维拒之。何则？其为之守备者素也。”^{[3]60}军事战争中“天险”固然重要，但毕竟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决定战争成败者终究是人而非物（地势），因此，苏洵的三国军事评论在客观上是符合唯物主义史观的。

此外，古代军事战争虽形式繁杂多样，但基本形式可总结为攻、守二类，三国时期的战争亦不例外。苏洵格外重视军事战争中“守”的重要性，他认为若仅一味进攻而忽视防守，那么失败则是必然结果。他说：“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

亡也。”^{[3]68}苏洵认为诸葛亮、刘备放弃荆州而西进入蜀，本身就意味着恢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战略构想难以实现。这是因为历史上但凡过于依赖蜀地“天险”者，往往忽视防守，最终皆以大业难遂告终，正如蜀汉即便有剑阁、蜀道之险也无法挽回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

在宋元明清时期的三国政治军事评论中，学者多以刘备、诸葛亮自荆州西进取蜀为高瞻远瞩举措，并予以肯定性评价。如前所述，苏洵则从军事历史地理角度反其道而论之，指出蜀汉难成统一大业的原因：一是蜀地距中原过于遥远，用兵与粮饷运输成本太高，此乃兵家大忌；二是作为军事家的诸葛亮只注重“攻”而忽略“守”，而用兵又过于谨小慎微，不敢接受魏延子午谷奇谋的军事策略。这一史论颇有见地。苏洵对三国蜀道的历史地理有着透彻的了解，对蜀道用兵历史十分熟悉并有深刻洞察，在其史论《攻守》篇中推崇邓艾择阴平道出奇兵灭蜀之举，“邓艾攻蜀，自阴平由景谷攀木缘磴，鱼贯而进，至江油而降马邈，至绵竹而斩诸葛瞻，遂降刘禅”^{[3]4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蜀道在三国魏蜀争战中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这一点苏洵非常看重。他曾如此评论：

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3]68}

苏洵的策论、史论多次涉及三国时期蜀道的区位优势与攻守之要，反映了他独到的三国军事地理评论眼光。

苏轼一生仕宦于北宋五朝，亲身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政治转折，自身仕宦生涯坎坷曲折，命运大起大落。如此丰富的政治经历与对历史的熟谙与反思，形成了他察盛观衰、见微知著的史家眼光，且能以富有文学性的笔触抒发对历史人物的感慨。苏轼史论的一大特点是擅长对人物的评论，说古论今、雄健豪放，充满史识与哲理。苏轼的历史评论上至夏商周三代，中至秦汉三国，下到隋唐五代，涉及面广，评论历代朝政得失、臧否历史人物品性，皆有感而发，见解独到，不落俗套。其史论对三国人物的评论除

撰写《魏武帝论》《诸葛亮论》两篇专论之外,还在策论、奏疏、题记、诗词、信札中频繁引用并评论三国史事与人物事迹,可见其对三国人物与史事的熟谙以及独特的评论风格与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帝王处于权力结构的顶端,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核心。皇帝统御天下,治理臣民,其帝德、才干、决策甚至心胸度量,都关涉其道德示范作用、社稷形象以及王朝政治的长治久安。曹操生于汉末乱世,彼时群雄并起,诸侯对峙,军阀混战,以致民不聊生。相较于其他诸侯与军阀,曹操的政治与军事能力无疑更为卓越。面对中央政权分崩离析、沧海横流的乱世,他在十多年来,对内剪除袁绍、吕布、刘表、马超等割据势力,对外则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诸部,更经官渡之战,一举统一北方,可谓天下第一豪杰,时人评其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4]3},特别是其政治、军事谋略无出其右,连诸葛亮都不得不赞叹“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4]912}。但曹操亦有好色、多疑、诡诈、嗜杀之弊,遂成为后世评价中极具争议之人物。自唐代以降,对他的主流评价形成贬多褒少的趋势,特别是元末明初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问世后,在民间更是形成“贬曹褒刘”的评论取向。

苏轼对曹操的评论是从“智”与“利”两个角度展开的,并没有进行一边倒的道德评价,而是否定中有肯定。他高度评价魏武帝曹操的才干将略与拨乱反正之功,同时称曹操为杰出诗人文豪与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其杰出诗人的才华气质又是刘备、孙权、诸葛亮等人物难以望其项背的。苏轼特别欣赏曹操的诗人风采和英雄气度,其《前赤壁赋》中所刻画的曹孟德“横槊赋诗”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他曾经以官渡之战为例,从“气度”角度分析曹操与袁绍二人的不同特点,《曹袁兴亡》云:

魏武帝既胜乌桓,曰:“吾所以胜者,幸也。前谏我者,万全之计也。”乃赏谏者,曰:“后勿难言。”袁绍既败于官渡,曰:“诸人闻吾败,必相哀,惟田别驾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杀丰。为明主谋而不忠,不惟无罪,乃有赏。为庸主谋而忠,赏固不可

得,而祸随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兴亡者。^{[5]2018-2019}

可见,苏轼对曹操的褒奖,更多是诗人文豪之间的惺惺相惜,很大程度上带有感性化的倾向。

苏轼《魏武帝论》将曹操与孙权、刘备的政治优劣作了对比分析。苏轼认为东汉末年中央王朝分崩离析,国运何去,需要大智大勇者挺身力挽狂澜,但如何安邦济世则需要高超的应变将略。欲拨乱反正、澄清宇内,非曹操这样的英雄豪杰而不能胜任,苏轼说:“世之所谓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审乎计之得失,如斯而已矣。”^{[5]82}曹操作为政治家,当天下大乱之初能够顺应时变,审时度势,“挟天子以令诸侯”获取制服诸侯之资,这为曹魏帝业奠定了基础,是其一大妙策高招。但曹操的政治、军事生涯也有短板与败笔,他挥师南下而遭赤壁之败,西征汉中张鲁而优柔寡断,失去乘胜西进灭蜀之良机,特别是他始终未能识察司马懿这个最后端掉曹魏政权的“卧底”,终生未能完成一统大业。《魏武帝论》全篇围绕“天下利害”这一主题展开评论,高屋建瓴、气势雄劲,将一代枭雄曹操的功过与命运放在充满得失利害、变数的历史环境中评论。因而其对曹操的评论也就没有落入“抑曹扬刘”的单向思维窠臼,这显得其历史人物评论立意高远、不同凡响。

蜀汉丞相诸葛亮有“三国第一人”之誉,一生为恢复汉室辅佐先主、后主二帝,南征北战,鞠躬尽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其声名在宋代日益显赫,深受朝野尊崇。但苏轼对诸葛亮的评论也并非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有褒有贬。他从道德典范角度将诸葛亮所代表的君臣关系提高到与三代圣贤比肩的高度,“古之君臣,有如二君而不相疑者,汤之于伊尹、刘玄德之于诸葛亮是也”^{[6]352},“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论”^{[6]763}。并且他在诗中也对其高度评价,“有怀诸葛公,万骑出汉巴。吏士寂如水,萧萧闻马挝。公才与曹丕,岂止十倍加。顾瞻三辅间,势若风卷沙。一朝长星坠,竟使蜀妇髽”^{[6]16},对诸葛亮出师未捷、未能完成政治大业表达了深深的惋惜。但在《诸葛亮论》中,苏轼却又把诸葛亮政治、军事中的智慧谋略斥责为“诈力”:“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

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5]112}

苏轼认为以诸葛亮之贤智，其文治武功中不应将“仁义”与“诈力”夹杂在一起，而诸葛亮却在与孙权借荆州、与刘璋“合作”中采用了“诈力”即计谋，兼并西蜀并取而代之，这从政治道德角度而言，是违背仁义的，“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5]112}。可见，苏轼对诸葛亮的评价并非以事功为基准，而更多是从政治道德层面进行考量。苏轼认为诸葛亮辅佐刘备争夺天下时运用了“诈力”，这与曹操的奸诈并无二致，此观点即便在宋代史论中亦属少见。从军事战略学上说，诸葛亮作为兵家在战争中以智谋取胜实则无可厚非，更何况古代兵法有“兵不厌诈”之说，苏轼谴责诸葛亮用兵使用“诈力”，认为这是其一大“污点”，这种看法失之偏激与迂阔。

三苏中，苏辙关于三国的历史与人物论述最多，其三国史观也最为丰富，当然一些论点也曾引起后世的非议。苏辙不仅著有三国总论，还著有多篇三国人物专论，如《三国论》《荀彧》《贾诩上》《贾诩下》《刘玄德》《孙仲谋》，另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管幼安画赞(并引)》。苏辙的三国史论善于从三国人物具体思想特征切入议论，如《三国论》讨论的重点是“勇”这一概念，并从这一概念出发对曹操、刘备、孙权的“智”与“勇”进行品评：“此三人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者。而不知因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7]1252}苏辙不赞同当时流行的“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7]1252}坊间说法，对刘备的德才予以高度评价：“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三国之君，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独有一刘备近之而未至。”^{[7]1252}苏辙认为刘备之才类似汉高祖刘邦，不能从一般的“勇”与“术”来评价之，这实则是继承了陈寿评价刘备“信义著于天下”的观点，故认为刘

备有经天纬地之才，因而能招徕天下英才于麾下，干出一番霸业。当然，苏辙也探讨了刘备未能统一天下的原因：

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间，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百败而其志不折，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7]1253}

因而苏辙强调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在相互之间的博弈中不仅要有“勇”，更要有“智”。

苏辙三国史论的另一特点是在奏议与策论中善于引用三国故事与人物典故为自己的政治见解提供历史依据以增强说服力，并能对解决现实政治中的朝廷弊政有所裨益。苏辙上皇帝书中有“三论正邪札子”，其第二论中引用《出师表》中诸葛亮对后主“亲贤臣，远小人”的告诫，以保证朝政的严肃性与纯正性，“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7]760-761}。苏辙善于以三国史实评论当朝政治之得失，认为国家独当一面的将帅应该是“执法廉平”之人，即自身廉洁、赏罚分明以得军心。他在《再论分别邪正札子》中言：

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严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严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之无怨者，非有它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其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其不合人心者尚不为少，彼既中怀不悦，则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纳之，以平其隙，臣未见其可也。^{[7]762}

宋仁宗时期，用兵西夏乃涉及王朝西北安全战略大事，虽有韩琦、范仲淹、夏竦、庞籍等名臣良将镇守西北，但对西夏防御仍然比较被动。苏辙强调要重视借鉴蜀汉诸葛亮北伐常因后勤保障不济而失败的历史教训，认为粮草问题乃用兵作战之大事，若此问题解决不好，则再高明的统帅也难以取胜，“诸葛亮用兵如神，而

以粮道不继，屡出无功。由是观之，苟无其财，虽有圣贤，不能自致于跬步。苟有其财，虽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7]368}。

苏辙的三国史论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特别是常为上层政治与朝廷择帅用兵提供历史借鉴。他认为朝臣乃国之栋梁，是国家最高政治集团的构成部分，不可混入奸邪之人，否则将会带来朝政混乱。因此，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告诫不仅是治国理政的至理名言，其精神内核更可为帝王用人实践提供直接参考与借鉴。在《论西事状》中，苏辙针对宋军对西夏用兵时，因“授将非人，赏罚不明”而屡遭败绩的现状向宋仁宗疾呼，择将用人必须慎之又慎，主帅更应具备诸葛亮那般严于律己的良好将风。他说：

诸葛亮为相，任马谡不当，请自贬三等，以右将军领事。盖大臣体国，不惜身自降黜，为众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岁册命阿里骨与议大臣，不论去位在位皆夺一官？至于两路将帅，虽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废，皆使随罪行罚。以此号令四方，庶几知所畏惮。政修于朝廷之上，而敌人恐惧于千里之外，势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闻范仲淹守庆州，困葛怀敏之败，请以任将非人，因两府逊谢，损其勋爵，而复其位，以激励诸将，感悟边兵。时虽不用，而仲淹之言，至今惜之。^{[7]725}

在苏辙看来，军事征战，用兵贵乎神速，一旦优柔寡断、踌躇不前，则往往丧失良机、悔之不及。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在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下，由抗击西夏前线王韶总指挥，宋朝收复了宕、叠、洮、岷、河、临（熙）六州，取得空前胜利。战前，苏辙在进献朝廷的《再论熙河边事札子》中，借三国初期曹操西征张鲁拿下汉中后未能一鼓作气占领蜀地的教训，告诫朝廷对西夏用兵要抓住战机。他说：

昔曹公既克张鲁，刘晔言于公曰：“公既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诚因其倾而压之，蜀可传檄而定。若小缓之，蜀人既定，据险守要，不可犯矣。”公不从，居七日，闻蜀中震动，公

以问晔。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夫机会一失，七日之间，遂不可为。^{[7]764}

曹操西征汉中，一举收降张鲁，本可趁热打铁西征入蜀，但他却没有采纳臣下意见，撤兵北还，一统天下大业终告未遂。虽然曹操如此决策事出有因，但苏辙认为此事却有现实意义，即用兵征战，若不能当机立断，则戎机稍纵即逝。苏辙总结三国一世，曹操兵败赤壁，不得江南，而孙权也始终未跨江向北，“莫肯求逞于中国”，主要原因还在于曹操时代实力不逮，无力一统天下，孙吴集团将士则志在保一方平安，并无吞并曹魏大志。因此，三方势均力敌，形成三国鼎立、相互制衡的格局。这些三国史论，在北宋抗击西夏的文化语境下有着强烈的借鉴意义。

三、三苏三国史论的差异

在三苏的历史文化知识结构中，三国历史与人物均占有重要地位。三苏皆熟谙三国史事，并且善于从三国史事中汲取历史智慧与经验。尤其是在苏轼与苏辙的奏议、诗词、政论、史论中，三国人物与史事占有一定比例，而且是其重要的史据与典故。三国文化在宋代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巴蜀地区作为三国历史与文化重要策源地，士人对此感触之深不言而喻。三苏生长于蜀地的文化家族，其政治、文学生涯的知识背景与三国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

苏洵长于对三国军事地理的评论以及对政治与人物的臧否。三国史事与军事地理是其在策论中常用的史例，苏洵对发生在蜀道沿线的三国史事谙熟，这与其早年赴京应试往返蜀道有关。苏轼文献所涉三国史事、人物较多，其三国文化观、历史观广泛地穿插于其政论、策论、史论、诗词之中，其中不乏对三国人物、史事独到的评论。知枢密院章惇与门下侍郎司马光“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譖侮困光，光苦之”^{[6]572-573}，苏轼以三国时期法正、许靖的故事调解二人的矛盾。他劝告章惇：“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6]573}如此，章惇与司马光的对立状况得以缓

解。在对三国人物评价方面,苏轼除了前揭对诸葛亮持有褒有贬的态度外,对刘备也同样有所批评,在其《严颜碑》诗中就借观瞻断头将军的碑碣将刘备攻灭西蜀刘璋视为“不义”行为:“先主反刘璋,兵意颇不义。孔明古豪杰,何乃为此事。刘璋固庸主,谁为死不二。严子独何贤,谈笑傲堪几。国亡君已执,嗟子死谁为。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泪。吁嗟断头将,千古为病悸。”^{[6]515}刘备在陈寿《三国志》中是一个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的君主,被誉为“信义著于天下”,而且是唯一没有贬辞的“完人”,后世对刘备的评价也几乎是一边倒的褒扬,苏轼则从儒家政治伦理出发,批评刘备用“诈力”夺取刘璋治下的成都,终究难逃道义的谴责。这一观点竟然与司马懿所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8]的说法颇为类似。当然,苏轼也毫不掩饰对三国时期一些有气节、有直率个性人物的喜爱之情,如多次发表对孔融风骨气节的推崇:“吾谓北海以忠义气节冠天下,其势足与曹操相轩辕,决非两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汉室,岂所谓轻于鸿毛者?何名为蠹哉。”^{[5]2292}“堂堂孔北海,直气凛群儿。”^{[6]133}究其原因,主要是苏、孔二人在性情、心理、气质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惺惺相惜,苏轼引孔融为异代知己。较之其父其弟,苏轼的三国史论与人物品评显得更具个性取向。

苏辙的三国论述在三苏中最为丰富,在奏议、策论中对三国历史人物引用最多,尤其善于总结三国历史人物的经验与教训,用来作为解决北宋社会现实问题的例证,这一特点在三苏中最为突出。苏辙的三国史事知识可谓信手拈来,常通过对三国史事的分析增强其文章的说服力。在与名相富弼的通信中,他借用贾诩称赞曹操以少胜多、力克袁绍来表达对富氏的尊崇:

尝见曹公与袁绍相持久而不决,以问贾诩,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绍兵百倍于公,公画地而与之相守,半年而绍不得战,则公之胜形已可见矣。而久不决,意者顾万全之过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岂亦此之故欤?明公其略思其说,当有以解天下之望者。^{[7]384}

苏辙晚年退隐河南颍川,落寞苦闷中潜心

史书典籍寻求精神慰藉,探讨历史人生。他对《三国志》中管宁这一人物颇为青睐,《在管幼安画赞(并引)》中说:

予自龙川归居颍川,十有三年,杜门幽居,无以自适,稍取旧书阅之,将求古人而与之友。盖于《三国》得一人焉,曰管幼安宁。幼安少而遭乱,渡海居辽东,三十七年而归。归于田庐,不应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没,功业不加于人。而予独何取焉?取其明于知时,而审于处己云尔。^{[7]1208}

管宁博学多才、苏世独立,早年因黄巾起义避乱于辽东,黄初四年(223年),司徒华歆举荐管宁。魏文帝、魏明帝多次征辟管宁,皆固辞不受。在外避乱垂三十年,晚年回归,终老故里。在众多的三国人物中,苏辙唯独对管宁青睐有加,“取其明于知时,而审于处己”。这表明了苏辙对三国人物独到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

结语

概而言之,三国人物与历史文化既是三苏常涉及的话题,也是三国文化对后世影响的重要个案现象之一。三苏家族崛起于西蜀眉州,蜀地又是三国蜀汉政权的政治中心与三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存有大量的三国遗迹。蜀地是三国人物刘备、诸葛亮、法正、庞统、赵云、蒋琬、谯周的主要活动舞台,他们在巴蜀地区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到了宋代,三国文化在四川可谓流传广泛。在三苏的历史文化知识结构中,三国历史与人物占有重要地位。三苏熟谙三国文化,在他们的奏议、诗词、政论、史论中,对三国人物与史事几乎是信手拈来。三国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广泛的影响,对巴蜀的影响尤其深远。而三苏生长于蜀地的文化家族,在其成长与政治、文学生涯中和三国文化都有着密切关系。苏洵长于对三国军事地理的评论以及对政治与人物的臧否,三国政治与人物也是其策论中常用的史例,尤其注重总结三国历史人物的经验与教训。三苏对三国人物的评论不尽相同,苏轼的三国历史观主要体现在其政论之中,常与众不同,对传统意义上评价颇佳的诸葛亮、刘备等蜀汉人物多持批评态度。苏辙的三国史

论则更有特点,善于将三国史论与现实关怀相结合,以三国史事与人物劝谏帝王与上司,充分借鉴三国历史经验与智慧,力求探赜于史而有裨益于时。

唐宋八大家之中,三苏一门几占其半。作为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三苏史论堪称宋代历史评论的卓越代表。其中,他们对三国历史的论述尤为特出:一方面,这是宋代士大夫阶层文化反思的结晶;另一方面,其论述无论是对史事本身不落俗套的阐释,还是以古鉴今、借三国典故干政的策论,皆立意新颖、见解深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成为三苏史论中极具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马端临:《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9—1624页。②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3,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③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东坡自黄冈移汝坟,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按刘道原即刘恕,早在乌台诗案发生的前一年(1078年)已经谢世,这条史料邵博记载人物有误,所言刘道原盖指刘道原之子刘羲仲。徐度《却扫编》卷中有载:“刘羲仲字壮舆,道

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深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谬,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期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朱弁《曲洧旧闻》、晁补之《鸡肋编》等也有类似记载。以上四篇文献分别参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40、39、30、23册,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

参考文献

- [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 [2]赵尔巽,等.清史稿[M].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7:13316.
- [3]苏洵.嘉祐集笺注[M].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4]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苏轼.苏轼文集编年笺注[M].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
- [7]苏辙.苏辙集[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 [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

The Three Sus' View of Three Kingdoms History and Its Intellectual Tension

Ma Qia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knowledge system of Su Xun, Su Shi, and Su Zhe, the history and figures of the Three Kingdoms held a significant position. The Three Sus' perspectives on the Three Kingdoms are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their political discourses,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poems, and other writings. The characters and events of the Three Kingdoms served as crucial historical references and allusions in thei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discourses. Influenced by the rich Three Kingdoms culture in the Ba-Shu region, the Three Sus, as a literary family native to Shu, were naturally well-versed and deeply engaged with this subject. The Three Sus' discussions of the Three Kingdoms each possesse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figures they addressed, Su Xun excelled in commenting on the military geography of the Three Kingdoms,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military affairs of the Shu roads; Su Shi offered reflective and critical evaluations of Three Kingdoms figures, making h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unique for his time; Su Zhe produced the most extensive discourse among the three, frequently citing Three Kingdoms events in his memorials and historical essays. He focused on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political affairs, military affairs, and historical figures, and adeptly used historical examples to shed light on the present, often citing Three Kingdoms events as examples to address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his Three Kingdoms historical outlook. Collectively, their historical theories on the Three Kingdoms form a profound and dynamic component of Song dynasty historical thought.

Key words: The Three Sus;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Kingdoms History; military geography; character evaluation

[责任编辑/木 卯]